

文本革命

当代西方文论的一种视野

戴阿宝 / 著

TEXT REVOLUTION

Dai Abao

文本革命

当代西方文论的一种视野

戴阿宝 / 著

TEXT REVOLUTION

Dai Abao

辽宁大学出版社

©戴阿宝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本革命/戴阿宝著.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7. 1
当代西方文论的一种视野
ISBN 978-7-5610-5232-7

I. 文... II. 戴... III. 文艺理论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0865 号

责任编辑: 窦重山

封面设计: 邹本忠

责任校对: 李 佳

辽 宁 大 学 出 版 社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网址: <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印张: 10.25

字数: 260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作者简介

戴阿宝，1960年11月生，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艺研究》杂志社编辑。已出版著作《终结的力量——鲍德里亚前期思想研究》、《问题与立场——20世纪中国美学论争辩》（合著）等。

序

我为什么选用“革命”作书名

请名人写序是学术界的惯例。辛辛苦苦写一本书，如果能够请一位（或几位）名人为其写一篇（或几篇）序言，如同新娘有了漂亮的婚纱和丰厚的嫁妆，不仅是对作者本人劳动成果的一种肯定，而且也具有某种强力推荐的味道，能让大家更好地认识作者的可爱和可取之处。对作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在本书的写作期间，我也曾经想过是否请名人为本书写序言，但思量再三，总觉得无法摆脱一种难言的胆怯，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

没有了名人写序，我自己倒是想在本书的开篇之前唠叨上几句，算是一个自序吧。

本书的题目是“文本”加“革命”——“文本革命”，我自以为这是一个还说得过去的名字。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书名？这肯定不完全是跟着感觉走的结果。斟酌起来，除了潜意识里有点舍不得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的“宏大叙事”，也许还有一些其他的话可以说说。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新中国的“革命”闹得最火红的年代开始记事。坦白地讲，我记忆中的革命，既没有后来大人们控诉得那样的残暴和无理，也没有历史学家们描述得那种腥风血雨般的惨烈和悲壮。对我而言，革命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是

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喧闹的人群、震天的锣鼓、招展的红旗、激昂的口号，它总是与一度让人迷恋的理想、信念、追求什么的联系在一起。不管怎样，革命是值得人们去留恋和缅怀的。如果说我有一些挥之难去的心理情结的话，革命肯定是其中之一。我自知，缺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对革命时的那种自豪和荣耀，但对革命的回味却时时发生。当然，随着岁月的流逝，革命的内涵在我的心目中也在发生某些改变。实际上，革命对于今天的我来说已经更多地意味着力量、变革和激情。至于在当下是否应该如此认识革命，是否值得大肆宣扬革命，是否符合历史所赋予革命的真正内涵，还有相当的讨论和批判的空间，但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我对革命充满了温情。

革命，是时代的产物，是属于那些为了种族、阶级、集团利益而奋起反抗的人们，它通常具有暴力的形态，是通过人们之间肢体的冲突而导致具体的时空环境的改变。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视角出发，那么，我在本书中所使用的标题——“文本革命”，就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了，因为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无法从所谓的文本中寻找那种革命的肢体运动，那种革命的枪炮声和火药味。不过话又说回来了。20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曾提出过一种文学理论主张，即所谓的“陌生化”原则。学习过现当代西方文论的朋友们一定对此耳熟能详。那么，我在这里把“文本”与“革命”连接起来，算不算是一次陌生化手法的运用呢？或者说，算不算是在制造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呢？是否能够达到什克洛夫斯基所追求的“使石头变成石头”的修辞期待呢？石头本来就是石头，但是由于人们对它司空见惯，麻木不已，不自觉中已经完全失去了感觉石头的能力和兴趣。那么，如何重新唤起人们对石头的感觉？这是什克洛夫斯基所苦恼的问题。他的解决办法是，通过语言的陌生化表述，使人们在陌生的语境中尽可能恢复已经变得迟钝的感觉机能。我在本书的书名中选用“革命”一词，也正

是试图进行一次陌生化历险，从而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警觉。

今天，谈论革命已经不再是一个时髦的话题了。记得在上个世纪末，有两位曾经是中国学界的名人，一位是李泽厚，一位是刘再复，他们在一起搞了一个对话，叫“告别革命”。他们在对话里深入反思了革命一词，对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革命进行了甄别和评价，最后提出要“远离革命”的口号。我虽然自认为有一种革命情结，但并没有从理论和历史的高度来认真思考过革命对人类的意义，所以，还无法很清楚地认定他们两位的主张是否值得肯定。但从一般意义上讲，我对他们的想法是钦佩的，因为他们二人都是严肃的学者，都是属于那种在非常认真地思考中国现状和人类未来的学者，也是不会用任何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做交易的人。他们亲身经历了起码是在新中国出现过的一切形式的革命，见证了这些革命，也从历史的著述和革命的理论中大量地了解了革命的目的、形态、后果，他们的结论不是一个随便的率性而发的结论。当然，他们对革命的理性反思并没有影响到我自身的革命情结，因为比较而言，我心目中的革命只能说是一种对情绪和记忆的留恋。所以，当我今天选用“革命”作书名时，不仅没有任何的不安，反而有一种在语言修辞中追求陌生化的快感。

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来看待革命二字的。如果你是一位革命的崇拜者，那么你从一开始就会感到我选用革命一词作书名的内在魅力。文本是什么？文本会有怎样的革命性质？它真的能够成为革命的一分子吗？“文本革命”到底表达了怎样的一种思想和理念？这样的问题或困惑使你在今天革命已经受到冷落甚至被人们遗忘时再次遭遇它，从而在十分陌生的语境中多出了几分意外和欣喜，不禁想把革命再仔仔细细地打量一番。但倘若你不是一位革命的崇拜者，而是对革命比较默然或反感的人，那么读到这样的一个书名，你同样会有一种无法克制的欲望，想看看这个宣

扬所谓的“文本革命”的家伙到底说了一些什么？革命怎么会如此堂而皇之地被再次搬上舞台呢？革命在当代西方文本世界里到底是怎样的一副面孔？这难道不是陌生化使然的效果吗？我看，是。

其实，当我选用革命来描述我在书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时，或者说，当我用革命来谈论当代西方文论所发生的变革时，我的意图是要揭示当下的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或者说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在文本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时，这场变革是无法回避的。表面上，我们所看到的是文本成为前景，作品日益萎缩，这种对作品观念的瓦解彻底改变了文学话语的生态场，但更为深入的内涵是，20世纪以来人类的整个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变革，文本正是这一变革的一个支点，也成为走进这场革命的具体路径。

当一场思想运动或一种理论学说把过去二千余年所积累起来的陈规戒律作为颠覆的对象的话，除了使用革命二字，还有其他更加贴切的概念或术语来表述这一现象吗？我感到很欣慰的是，我记忆中的那种浪漫而美好的革命符号又有了一次吸引眼球、拨动大脑的机会，又有了一次施展自身魅力的机会。我应该感谢和感激，是人类丰富的语言和语言的丰富性把革命又重新打扮了一番，在精美的包装下再一次隆重出场，将完成一次优雅而韵味十足的“革命秀”。

但愿，我没有辜负革命对我的期待，也没有辜负读者对“文本革命”的期待。

是为序。

作 者

2006年12月

导 论

翻开当代西方文论著作，你会发现，文本（text）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显词。其使用频率之高、范围之广、涵义之复杂、界限之模糊，着实令人吃惊。文本简直变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文论神话。

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文本显然是一个无法绕过的术语。由此，文本研究作为本书的主题也就有它足够的理由了。

文本问题是一个怎样的问题？文本拥有怎样的内涵和边界？是否存在一种可以称之为“文本理论”的理论？文本带给当代西方文论哪些新的特征？文本的意义又该如何去评判？……

这一连串的问题需要回答。我正是试图置身于那谜一样的文本世界，去索解其中的奥秘。

那么，从哪里开始呢？我想，我首先会问，我也首先会被问：在当代西方文论中，文本是何时成为问题的？文本又是何以成为问题的？

第一节 文本与文本的发生

威廉姆斯 (William P. Williams) 和艾伯特 (Craig S. Abbott) 在文献学的意义上索定文本。文本在文献学中是指原文。在中国古代历来就有所谓的训诂学和考据学, 有索隐派的文学和历史的研究, 旨在寻求作品的“原文”、“原义”^①, 在西方的《圣经》研究中, 对原文、原义的求解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威廉姆斯和艾伯特在他们的《文献学和文本研究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ical and Textual Studies*) 一书中指出,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 文本是一种拥有物理实体的存在物。比较而言, 作品开始于作者的心灵, 但由于它的不可接近性, 所以作者必须用纸和笔、或用打字机把思想和情感通过文字记录下来。由于记录(传递)过程中的变化或失误, 手稿或打印稿都会留有作者修正的痕迹, 会出现手稿或打印稿之间的差异。一个简单的例子: 在古英语的拼写固定下来之前 [这一时间大约在 1755 年, 这一年, 约翰逊 (Johnson) 出版了他的著名的《词典》], 许多单词, 作者通常是根据个人爱好来拼写的, 如 do 可以写成 doe, go 可以写成 goe, catholic 可以写成 cathlick, 等等, 这些都对文本的鉴别和评估产生影响。文献学旨在追踪文本的历史特征, 追踪文本在过去时间里产生的变化以及不同变化之间的关系。同时, 由于文本的最初形态是由作者完成和确定的, 所以, 作者对文本具有不可剥夺的拥有权和决定权。从这个意义上说, 最大限

^① 比如, 陆宗达曾对“训诂”一词进行了解释。他根据古代的“训诂”实践和理论, 总结出“训诂”研究主要是消除语言障碍, 达到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参阅陆宗达《训诂简论》, 北京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一部分“什么是训诂?”

度地提供作者的思想和方法，并以此作为鉴别文本的第一背景，也是文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①。

从文献学考察文本，至少可以获得如下结论：（1）文本的内容和形式是由作者直接赋予的，文本在出版过程中不断地被修改，导致文本内容与作者思想之间出现某种程度的差异，但无论文本产生于何时，或采用哪一种形式，作者是文本的最基本源泉这一点毫无疑问；（2）由于文本产生的过程相当复杂，可以有多种版本（或抄本）流传下来，这样一来，哪一种文本是最原始的文本，是与作者的思想 and 情感最相贴近的文本，就成为文献学研究的一项基本任务；（3）对最原始的文本的寻求和认定，包括一系列细致的技术手段和过程，反映出文本的物质形式的重要性，也反映出原文的决定性意义。

当然，文献学的阈限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一点并不反映在文献学本身，因为无论如何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有着明确的目的和成熟的方法。问题在于，倘若我们要在不同的语境下来观照文本的具体存在形态，它的特征和意义，会发现文献学的过分技术化的研究方式反倒成为一种限制，而且它对作者与文本关系的强调也削弱了文本自身蕴涵的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在文献学之外寻找另一种观照文本的方式，以达到还原文本遭遇问题的初始语境的目的。这就把文本发生研究推到了前台。谈到文本发生，通常把它与人类的书写行为联系在一起，书写又是文字发明的一个必然结果。在文字发明之前，任何意义上的书写都是不可能的，而一旦进入书写，文本就呼之欲出了。当然，这样

^① William P. Williams and Craig S. Abbott,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ical and Textual Studies*,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85, pp. 41-51. 他们指出，文本最初经过一个抄写传播阶段，时间大约在 1450~1800 年之间，1800 年之后，文本的保存和传播进入机械印刷阶段，这一过程趋于复杂化，因为出版者和市场开始介入文本的存在。

的事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其起源的复杂性和深远的影响力需要全方位的衡量和评价。就本书而言，文本发生研究要求我们把视野从宏观的历史考古收回来，直接面对文本在具体发生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语境症候，这样才有可能恰当地呈现出文本发生的内蕴及其变化。

在语源学上，文本源自拉丁文 *texere*，词义近于英文的 *to weave*，中文翻译为“编织”比较恰当。从这一意义源头出发，可见文本既非封闭自足，也非书写者所独有，而是强调自身“架构”（*fabric*）的建造和拆解的无止境性^①。至于文本更进一步的流变细节，尽管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但几乎任何的一部涉及文本问题的当代西方文论著作都缺乏翔实的考证。我们弥补这一不足的办法是在不同的文本语境中寻找文本出场的比较原始的蛛丝马迹。比如，加达默尔从考古的视角来观照文本发生：“‘文本’这个概念主要是以两个领域进入现代语言。一方面有圣经的文本，它的解释在布道文与教会教义中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文本代表了所有解释的基础，从而又事先成为信仰的真理。文本一词另一正常的使用与音乐有关。这里它是歌曲以及词的音乐的解释的文本，这样的—个文本与其说是事先给定的，不如说是演唱歌曲的残留物。这两种使用文本—词的正常的方式源自古罗马时代后期法官对语言的使用，他们根据贾斯丁尼安—世法典，用这一文本来克服其解释与应用的争议性。从这儿—一词的范围扩大了，它包括经验中—切无法成为整体的东西，代表回到能为理解提供一个更好的方向的所谓给定之物。”^② 加达默尔的文本考古，

①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② 严平选编《加达默尔集》，邓庆安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说明文本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性存在，而是有一个谱系，有一个解释的过程。无论是法典文本还是音乐文本，无论是上帝的手迹还是一般的文献资料，文本不可能脱离解释语境而发生。再比如，一部比较权威的辞书对文本发生有这样的描述：“……追随巴尔特，文本一词被后结构主义者所采用，旨在通过符号的无限制游戏而生产任何话语。一些批评家和理论家走得更远，把文本视为任何符号系统，因为对许多存在物和知识来说，只有在符号系统中才可能被理解，所以，它成为一个公共的空间，在此可以听到被作为文本的世界本身。”^①显然，这里的文本发生与后结构主义密切相关，文本也只有在类似这样的语境中，才能真正进入当代西方文论的视野，也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关键词。

法国学者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Pierre Mare de Biasi）在他的文本发生学中提出，研究文本可以从手稿介入，因为文本的主要关注对象就是手稿和版本。他强调“文本发生学使我们进入到作家的秘密工作实验室中，进入一部作品形成时的秘密空间里”^②。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的文本发生学有如文献学，是一种技术化的关于文本奥秘的研究，它对文本形成过程以及文本与作者关系的揭示，需要具体的手稿和版本的鉴定、比对和阅读。而我在这里所提出的文本发生研究是需要把解释的可信性和权威结论建立在文本出场所遭遇的初始语境之上的。由此，再谋求进一步拓展语境自身的影响力，展示出文本发生研究更丰富的内涵和价值。

①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General Editors: Joseph Childers and Gary Hentzi,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03.

② 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文本发生学》，汪秀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第二节 文本进入当代西方文论的方式

文本不是当代西方学者新创的一个术语，而是一个一直被使用且有较为固定含义和边界的“旧”词，也就是说，文本在进入当代西方文论之前就已经存在，文献学就是最好的佐证，文本以它本身的物质性、形式性以及与作者密不可分的决定性关系，在文献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那么，在当代西方文论中文本成为高频词的原因又何在呢？

我们不难发现，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为了增加理论的容量和力度，为了制造理论的新视点和问题，相当一些学者在大胆地甚至别出心裁地或改造旧词或杜撰新词。文本属于被改造之列。文本之所以能够凸显于当代西方文论，自然与它自身的特点有关。它与文字、书写、话语、作品等众多的关键词既保持着某种难以割舍的联系又与它们有所区隔，是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又不失其自身特色的术语。与文字比，它更突出符号性；与书写比，它更突出结构性；与话语比，它更突出书写性；与作品比，它更突出形式性。这样一来，当文本跳出文献学、摆脱原有涵义之际，当文本与文字、书写、话语、作品形成某种张力之际，新的理论阐释空间也就由此生成了。值得注意的是，文本在与这一系列相关术语的比较中，不仅强化了自身的特点，而且在所发生的初始语境中还持续引爆了当代西方文论内部从学科界线到理论内蕴的或消解、或颠覆、或整合、或改造的革命。

布洛克曼（Jan. M. Broekman）是通过如下方式把文本一词带入当代西方文论的。他说：“直到结构主义出现后，他们的著作（指文中提到的马克思、尼采、柏拉图或黑格尔的著作——

引者)才真正成为本文。”^① 简单的一个断言,意义却十分深远。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在于,在结构主义出现之前,“他们的著作”还不是“文本”,著作成为文本的条件起码是结构主义的出现,或者说用结构主义的眼光和方式来阅读著作。这样一来,文本在当代的意义实质上是与结构主义发生关系的结果。那么,文本在结构主义语境中拥有怎样的含义,或者说文本发生在结构主义语境中获取了怎样的特征?这首先涉及到结构主义批评与传统批评之间的根本区别。按照布洛克曼的观点,结构主义至少有如下四个特征:一是结构的包容性,即社会学、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符号学、解释学等诸语域,共同形成结构的材料;二是结构的语言决定论,即对于艺术、文学、哲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等语域来说,现代语言学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数学在科学中所起的作用;三是结构的解释学需要,即通常认为结构中并存两种意义,一种是直接的、初级的和字面的意义,另一种是间接的、第二级的和比喻的意义,而对后者的解释性揭示是结构主义的存在基础。四是结构的符号性,即结构自身至少包含两个记号系统,语言交流系统和包含语言交流系统的系统,对这两个系统的研究构成了所谓的结构主义符号学^②。文本与结构的结盟或者说文本被植入结构,文本构造出了自身发生的新语境,从而使文本的新内蕴成为可能。

牛敦(K. M. Newton)把解释学作为文本发生的初始语境,指出解释学的文本关注在于过去书写的文本继续存在并被不断地阅读,而这种存在和阅读是在文本作者和书写的历史场景已

^① J. M. 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4页。注意:布洛克曼在该书中介绍的“结构主义”包括了通常被认为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德里达等。

^② 参阅J. M. 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第93~105页。

经成为过去时发生的，也就是说，文本已经从原来的语境中脱离出来，所以“阅读这样的文本与解释问题难以分离”^①。可以看出，牛敦把文本植入解释语境的原因是文本原有语境的丧失，需要一个新的发生语境为文本获得新内蕴而创造条件。传统文学观念认为，作品意义通常区分为原意（meaning）和意义（significance），而这一点在新的解释学（如加达默尔的解释学）中是行不通的，因为新解释学认为文本的意义只可能与阅读者自我的处境相联系。“文本与阐释密切相关这一点完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甚至连一个文本的传统作为解释的基础也并不总是可靠的。的确，常常是解释首先导致对文本的批判性的恢复”^②。加达默尔对解释学的基本设定完全不同于传统解释学，而是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出发，把解释活动理解为本体活动，从而文本解释也就成为这一本体活动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加达默尔提出文本解释的境界是“视界融合”，即达到文本与读者之间的融合。从这里，我们获得了文本发生的另一个新的初始语境，也由此获得了解释学中文本的新内蕴。

我们还可以从文本在符号学中的出场表现观照文本的另一情形。文本的这一对文论的介入活动也是不同寻常的。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指出：“文本只能在与其它文本的关系中加以阅读，它通过符码使激活文化的话语空间成为可能。”^③ 这种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观念是建构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的，即文本不是一个自主的实体，而是一个互文的建构。当卡勒呼吁要区分传统的解释性批评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学批评之时，前者强调把

① K. M. Newton, *Interpreting the Text*,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0, p. 41.

② 严平选编《加达默尔集》，第60页。

③ Jonathan Culler, *The Pursuit of Signs: Semiotics, Literature, Deconstruc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8.

个人作品作为意义陈述来解释，后者并不试图解释作品的意义而是发掘作品中使意义成为可能的规则，而这一转换使文本从前者走向了后者。

当然，文本在当代西方学术语境中的发生状况还可以举出许多，如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福科的考古学、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等等。仅就此而言，文本在当代西方学术语境中的走红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它以自身的理论能量在新的初始发生语境中获得了不同凡响的辐射力，深刻地影响到当代西方文论的形态和内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本又是一个依附性很强的术语，它通过依附新理论而不断地剥离掉自身原有的旧义，也等于说是在不断地移动和改变着自身的内涵和外延，摇身一变而成为诸多新理论的存在之所。

第三节 文本的内与外

文本对当代西方文论的介入是通过重新构造初始发生语境而实现的。语境成为文本发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舞台。在语境构造中，文本时常会与其他术语发生联系，与其他“新词”有所纠缠，从而形成词与词之间的“互文”现象，彼此借用，共享意义空间。这里，我想提示两个与文本相近且边界并不十分清晰的术语——书写（writing，也译为“写作”）和话语（discourse），它们同样是当代西方文论中的高频词，与文本有着某种亲缘关系。

先说书写。书写在迄今出版的当代西方文论著作和辞典中，与文本一样，难以找到定义式的解释。这一方面说明当代西方文论自身回避定义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术语还在不断地演化之中，一时还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边界和较为确定的内涵。芭